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2025 年 9 月

## 創生與社造之間裂痕應該從哪裡修補

張綺庭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張綺庭(2025) 創生與社造之間裂痕應該從哪裡修補。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 摘要

本研究關注臺灣「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兩大政策實踐之間的張力與互補性。研究動機源自田野實習與社區參與經驗，觀察到社會力（社群凝聚與文化保存）與經濟力（產業振興與經濟永續）之間存在顯著斷層，導致政策與資源難以整合，影響地方發展效能。文獻回顧指出社區營造自 1990 年代以來深受國家政策主導，形成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矛盾並存的模式，且在都市化與全球化挑戰下，參與形式面臨侷限。地方創生則源自日本經驗，其核心在於文化、社群與產業的整合。然而在臺灣實務場域中，政策語言往往將地方創生定位為「超越社區營造」的整合平台，卻反而加深兩者間的二元對立，「建構—解構—再建構」的過程。

田野觀察發現，社區營造以居民互助與文化傳承為核心，依賴政府補助與中介基地的行政輔導，但在資源與能力上存在限制；地方創生則透過青年創業與文化商品化，嘗試將在地文化與市場機制結合，如旗山香蕉產業案例所展現的品牌化與價值再造。然而，其運作過程同樣充滿風險，包括市場壓力、政策規範與地方權力關係。本研究認為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應被視為互補而非取代的關係。前者提供社群基礎與文化資本，後者則延伸至產業運作與經濟永續。唯有透過跨部門協調與價值目標重構，才能整合社會力與經濟力，建立兼顧文化、社會與經濟的永續地方發展模式。

## 壹、文獻回顧

### 一、社區營造與社區營造培力基地的角色

社區營造的政策起源與國家認同建構，台灣社區營造的發展脈絡顯示其並非源於草根社會的自發性需求，而是國家政策主導下的產物。劉立偉指出，1990年代初期面臨解嚴後政權本土化的壓力，藉由「生命共同體」概念，展現國家推動社區營造的積極度。換句話說，社區營造作為國家新的文化論述，其根本目的在於重塑國族，而非單純著重於地方社區的實質需求。城鄉差異的被忽視與都市社區營造的困境，台灣社區營造政策存在著明顯的鄉村偏向，對都市社區的特殊性關注不足。劉立偉分析指出，1990年代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其核心關注多集中於鄉村文化的保存、景觀營造與地方產業的發展。然而，該政策設計在方向與內涵上，並未充分回應臺灣社會在此時期已高度都市化的結構性現實。(劉立偉，2008)。然而，台灣2006年的都市化率已達78.5%，近八成國民居住在都市地區，都市社區營造理應獲得更多關注。

都市社區面臨的挑戰與鄉村截然不同。夏鑄九的研究指出，都市社區的社會關係不像鄉村般緊密，居住地方的重要性日漸減少，工作地方則為首要考量(夏鑄九，2007)。這種「取代地方的網絡社會」現象，加上門禁社區的普及、晉紳化過程，興起等都市化現象，顯示都市社區營造面臨多元化與複雜化的挑戰。對於鄉村社區而言，社區產業活化與地方經濟發展確實是核心議題。然而，劉新圓的比較研究發現，台灣社區營造缺乏日本「造町運動」中核心的「改善地方經濟」要素，相關政策常聚焦於地方文化特色的挖掘，但對經濟體系的實質介入有限，難以為地方產業復興提供持續動能(劉新圓，2005; 李永展，2002)。

### 由下而上理念的實踐困境

社區營造「由下而上」的理念在實踐中仍存困境。陳其南（1995）指出，其推動多由政府主導，實際卻要求社區自我動員；政策初期更需仰賴政府引導（陳錦煌、郭程元，2004）。在「市民民主」與「市民賦權」框架下，市民可成為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者（Pestoff, 1998），但都市功能分化與中下階層的工作壓力，限制了參與空間（劉立偉，2008）。社區規劃師制度亦反映此困境：原為專業中介，實務中卻角色模糊（賴美蓉，2005；譚鴻仁，2004）。甚至可能變成培訓社區民眾成為擬似專業者的機制，這種「凡事親為」的實作參與模式，違背讓社區民眾真正當主人的初衷。

### 全球化脈絡下的社區營造挑戰

全球化發展對社區營造帶來新的挑戰與機遇。全球化重新界定「地方」的意涵，都市與區域成為對抗全球威脅的文化動員所在（周志龍，2002）。然而，台灣社區營造的「國家－社區」兩端點發展模式，明顯忽視全球化過程中全球與地方的連結（劉立偉，2008）。Florida（2002）指出，現代社會已由關係緊密的同質社群轉向多元化且以弱連結為主的結構。他所提出的創意階級，不僅影響經濟，也塑造社會、文化及生活型態。創意階級傾向「生活地點優先」，先選擇居住地再尋求工作，偏好多樣化生活、淡薄人際關係與半隱匿環境的社區（Florida, 2002）。此現象與「取代地方的網絡社會」概念相異，皆挑戰傳統社區觀念，顯示都市社群對生活場域重構的多樣性及持續發展潛力。

都市社區面臨門禁社區普及、晉紳化與創意階級興起等複雜現象，傳統以鄉村為主的社區營造模式難以因應。都市社區營造應跳脫狹隘視野，將議題與都市計畫、公共政策及多元社群連結，以提升適應性與可行性。現代都市生活的功能分化與

時間壓力，使「由下而上」的民眾參與模式受限。傳統強調居民親自參與的方式難以維持長期效能，需要透過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的橫向協調，建立更靈活、有效且可持續的參與機制。同時，中介角色如社區規劃師需明確定位，避免參與形式化。全球化與地方化並行，挑戰社區營造功能。過去政策偏重國家認同，市民社會培力與地方需求被邊緣化。未來應在國家認同、地方文化與市民賦權間取得平衡，以社區需求為核心，增強凝聚力與自主性。社會結構轉型如 M 型社會、工作時間延長與社會資本衰退，限制傳統社區參與模式可持續性。新型中介組織如社會企業，可結合社會服務與地方經濟，提供都市社區營造的新策略。台灣社區營造需考量都市特性、制度創新、地方需求與社會結構變遷，建立更彈性、可持續且符合都市複雜性的營造模式。

### 社區培力的價值定位與能力層次

社區培力的概念內涵呈現多元化發展，但其核心目標仍存在爭議。蔡弘睿與張菁芬指出，社區培力應是「社區能夠引出改善其生活之資產的過程」，包含資源、組織、方案規劃、網絡以及政治能力等多重面向。換句話說，社區培力不僅是技術性能力的提升，更是促進社會變遷與公民參與的媒介過程。然而，台灣現行的社區培力機制存在過度工具化的問題。多數培力服務仍停留在「懂得善用資源、會財務健全運作、能夠辦理許多大型活動」等操作性能力層次，而忽略社區工作的根本價值——透過集體意識行動激發，對社會需求與社會風險產生結構性回應（蔡弘睿、張菁芬，2016）。這種淺碟化與工具化趨勢，正是造成社會力與經濟力斷層的重要原因之一。

### 政策分割與資源分散的結構性問題

台灣地方發展政策長期呈現多頭馬車的現象。各政府部門對於社區的培力途徑「各唱各的調」，包括文建會的造人工作、環保署的環境保護志工組訓、營建署

的社區規劃師培訓等，缺乏橫向整合聯繫，經常造成資源重複浪費（蔡弘睿、張菁芬，2016）。這種政策分割現象直接導致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之間的斷層形成。在先前經驗觀察，地方發展的四種主要力量中，文化振興力與地方振興力、教育共學力之間已逐漸建立連結，但社會力與經濟力之間仍存在明顯斷層。換句話說，當前的政策架構無法有效整合不同部門的資源與目標，導致「共同致力於活絡社區的兩股力量卻常被分開討論與執行」。

### 英國社區發展經驗的啟示

英國的社區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y）經驗為台灣提供重要的參考模式。英國透過「鄰里更新委員會」（NRU）與「鄰里更新團隊」（NRT）等機制，建立政府、社區組織與專業團體之間的協調平台，有效整合社會力與經濟力（蔡弘睿、張菁芬，2016）。英國的社區政策明確以打擊社會排除與促進社會包容為核心目標，透過「地方性策略夥伴關係」（LSP）來協調各部門資源。相較之下，台灣的社區培力缺乏明確的價值定位與最終目標。蔡弘睿與張菁芬批評指出，台灣的社區培力「常常著眼於如何讓社區組織『動起來』，卻沒有引領社區思考為什麼應該要動起來」（蔡弘睿、張菁芬，2016）。這種目標模糊性使得社會力與經濟力各自發展，缺乏共同的整合願景。

### 社會資本與風險治理的整合思維

英國經驗特別強調社區組織在風險社會中的重要作用。Beck 的風險社會理論指出，現代社會面臨「不斷擴散的人為不確定性邏輯」，需要透過社會資本的建立來因應無所不在的社會排除風險（Beck, 1992）。英國通過建立「結合型社會資本」與「橋接型社會資本」，讓社區組織既能凝聚內部共識，又能與外部資源網絡建立有效連結。台灣的社區發展協會長期被視為政策工具，在政府、基層組織與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中介平台。蔡弘睿與張菁芬指出，多數社區組織「跟隨著補

助資源移動」，無法意識到社區實踐行動必須與社會發展趨勢及政策體系相扣連(蔡弘睿、張菁芬，2016)。換句話說，缺乏整合性思維使得社會力與經濟力各自為政，無法形成協同效應。

### 都市型社區與培力機制的特殊挑戰

都市型社區面臨的特殊挑戰。蔡弘睿與張菁芬認為，都會型社區通常面臨「鄰里關係網絡斷裂或缺乏社區總體意識」的問題，傳統的組織動員方法對習慣保有個人私密空間的都市民眾而言可能是擾民行為(蔡弘睿、張菁芬，2016)。這種都市化特性使得社會力的凝聚更加困難，同時也影響與經濟力整合的可能性。

首先，如何重新定義社區培力的價值目標，台灣社區培力缺乏明確的價值定位，導致社會力與經濟力各自發展。借鑒英國經驗，台灣應建立以「促進社會包容與地方永續發展」為核心的整合性目標，而非僅僅追求技術性能力的提升。其次，在風險社會脈絡下，如何建立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機制，英國的 LSP 模式提供重要啟示，但台灣需要發展符合本土脈絡的整合平台，特別是要處理文化振興力、教育共學力與社會力、經濟力之間的複雜關係。第三，都市型社區與鄉村型社區在整合社會力與經濟力方面有何差異，都市社區面臨特殊挑戰，但缺乏具體的整合策略。第四，如何從「培力」轉向「賦權」，現行培力機制過於工具化，缺乏真正的公民參與意識。未來的整合機制應更加注重社區自主性的培養，讓社區成為真正的政策主體而非執行工具。最後，在全球化與地方化雙重挑戰下，如何建立可持續的地方發展模式，這不僅涉及社會力與經濟力的整合，更需要考慮文化保存、環境永續、世代傳承等多重目標的平衡。

台灣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之間的斷層問題，根本上反映政策分割、目標模糊、機制僵化等結構性問題。通過借鑒英國社區發展經驗，結合本土實踐探索，有可能建立更加整合性與永續性的地方發展模式。這不僅需要政策制度的調整，更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地方發展的價值目標與實踐路徑。

## 二、地方創生的角色與衝突

地方創生的概念源自於日本，其核心意圖是因應人口外流、高齡化與區域經濟衰退等結構性問題，透過政策、產業與社群的合作來重塑地方生機(陳美伶，2018)。自 2018 年起明確將「地方創生」納入國家戰略，並強調透過「設計翻轉」與在地產業結合的方式，讓青年能夠返鄉就業，並帶動地方永續發展(行政院國發會，2018)。這樣的政策脈絡，也使地方創生不僅被視為一種經濟策略，更是一種社會文化再建構的過程。

地方創生的「建構」首先涉及對地方資源與文化的重新認識與盤點。地方創生的出發點在於「產、地、人」三位一體，必須同時關注產業發展、地方特色與人的參與(高啟霽，2018)。例如在屏東東港與金門的示範案例中，透過設計師與社區合作，將地方的文化符號、生活故事與產業資源重新包裝為商品或品牌，創造出文化與市場的雙重價值(楊佳璋，2018；張漢寧，2018)。這顯示建構並非單純的經濟行動，而是文化保存、居民認同與產業價值的共同生成。

在經歷解構之後，地方創生的核心在於「再建構」。這一過程體現在將文化資源與產業邏輯重新融合，並建立永續的地方經濟生態。研究顯示，地方創生案例往往透過文化鑽石模型的四個面向——創造者、社會生活、文化物件、消費者理由——來展現其完整性(Griswold, 1994；林育靚、吳連賞，2018)。地方創生並非單純的「賺錢模式」，而是一種結合地方文化意義、社群參與與市場需求的整體實踐。再建構不僅回應社區需求，也讓地方產業得以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壓力下找到新的生存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雖有高度重疊，但兩者的定位仍有差異。社區營造著重於居民生活改善、文化傳承與社群互動，不一定追求經濟利潤；地方

創生則以產業永續與經濟自立為目標，強調透過創意設計與品牌策略來延伸地方價值（行政院國發會，2016；林育靚與吳連賞，2018）。因此，若地方缺乏產業基礎或資源運作，往往會停留在社區營造層次；但當社區文化與社群網絡能與產業結合時，則能跨入地方創生的範疇。這也引發一個研究問題：是否只有與金錢掛鉤的產業發展，才能被稱為地方創生？

最後，關於「成功」的定義，學界與政策端也有不同的理解。部分研究認為，地方創生的成功應以經濟成果與產業持續性作為評估指標，例如是否增加就業、提高收入、吸引人口回流（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但也有學者指出，若僅以經濟數字為衡量，將忽略文化保存與社群凝聚的價值（張漢寧，2018）。因此，地方創生的成功應被理解為「文化—產業—社群」三方面的整合，不只是市場表現，更包含社會影響力的擴散。

### 三、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交織

「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是近年臺灣社會發展政策中的兩大核心概念，兩者雖有共同目標，即促進地方的永續發展，但其路徑與價值基礎卻存在差異。地方創生自日本引入後，往往被賦予經濟振興與人口回流的政策期待，強調藉由資源集中與產業發展帶動區域再生（增田寬也，2019）。相較之下，社區營造自1990年代以來則著重於凝聚社區意識、保存文化資產與培養居民公共參與精神，重點放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絡與地方認同（李晏佐，2023）。

然而，在政策推行過程中，兩者往往被視為一體，卻又各自獨立運作。行政院在推動地方創生政策時，曾明確指出其「超越社區營造」的定位，強調它是一種更高層次、能統合各種社區發展方案的平台（行政院國發會，2018）。這種「統合」的語言，實際上卻加深兩者之間的斷層。換言之，地方創生被建構為較優位的概念，而社區營造則被邊緣化成次要或基礎性方案（李晏佐，2023）。這樣的政策

論述，造成第一線實踐者在行動時難以明確判斷應該回應經濟發展的需求，還是維持文化與社會網絡的價值。

日本的經驗顯示，地方創生的政策導向本身就存在矛盾。增田寬也（2019）主張，解決「地方消滅」的核心策略在於提升出生率與防止人口過度集中於大都市，因而提出「選擇與集中」的政策思維。然而，木下齊（2018）則批評此種政策僅將「人口」視為問題根源，卻忽略「人才」的發展。他主張地方應如同企業經營，強調自主性與產業競爭力，而非單純依賴政府資源。換句話說，日本經驗凸顯地方創生內部的兩難：究竟要透過國家導向的宏觀人口政策，還是透過地方自主的經濟策略來推動？這種矛盾在臺灣的實踐脈絡中同樣存在。

首先，兩者在政策定位上的落差，構成主要爭點之一。行政院在 2018 年提出地方創生政策時，將其界定為「超越社區營造」的整合平台，意圖統合文化保存、產業振興與農村再生等既有方案（行政院國發會，2018）。然而，這種「統合」的說法實際上隱含價值排序，將地方創生置於更高層級，而使社區營造顯得次要（李晏佐，2023）。換言之，政策論述的語言並未真正促進協同合作，反而在實務中加深「文化—經濟」的二元劃分。

其次，日本的經驗凸顯地方創生內部本身的矛盾。增田寬也（2019）從「地方消滅論」出發，認為必須透過提升生育率與防止人口外流來避免區域消亡，因而強調「選擇與集中」的國家戰略。然而，木下齊（2018）則主張，人口只是表象，核心問題在於地方是否具備吸引人才與發展產業的能力，並提出「地方即企業」的經營邏輯。換句話說，地方創生在日本即呈現兩種相互矛盾的價值基礎：一是人口維持的國家戰略，一是自主經營的地方策略。當此概念引入臺灣後，其內在矛盾也隨之轉移到政策與實踐的落差中（木下齊，2018；增田寬也，2019）。

再者，在地實踐的案例顯示，兩者之間的矛盾並非抽象，而是具體呈現在行動選擇上。李晏佐（2023）以臺中第二市場為例，指出攤商普遍期待政府透過行銷與資源挹注帶回人潮與收益，而學界與文化團隊則希望重塑市場的文化教育與美學意涵。這種差異使得政策參與者無法就行動目標達成共識，呈現「經濟需求—文化價值」的拔河。換句話說，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的矛盾並非單純語言問題，而是深植於行動者對未來的不同願景。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矛盾集中於「社會力」與「經濟力」的斷層。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在目標上各有專長：前者偏向經濟與人口面向，後者注重社會文化層次。然而，兩者在政策與實踐中卻存在顯著斷層，主要表現在資源分配與價值取向的差異。矛盾之處在於：若僅強調經濟振興，則可能忽視社會凝聚與文化保存；若僅注重社會網絡，則又可能缺乏經濟支撐。換句話說，未來的研究與政策實務應著重於「如何整合社會力與經濟力」，避免兩者淪為各自孤立的發展路徑，而是形成互補、共生的在地發展模式。

## 貳、實作觀察與發現

### 一、社區營造的實際狀況與基地角色反思

社區營造作為台灣地方治理與在地發展的重要實踐，三十餘年來逐漸呈現出高度在地化與多樣化的面貌。其核心理念在於透過居民自主參與，累積社會資本、建構共好網絡，並保存與活化地方文化。然而，在實務中它並非理想化的「居民自主」模式，而是受到資源、行政、專業知識與社會結構等多重因素影響的複雜現場。

#### 1. 社區發展協會的角色與挑戰

社區發展協會是基層組織，負責居民服務、公共空間維護與文化推動。其行動多來自對地方的情感認同，但常受限於專業能力與行政經驗不足，例如計畫書撰寫、補助規範理解與志工管理。居民雖具備深厚地方知識，卻難以完全轉化為行政實力，往往需外部支持。這種落差為社區營造基地介入留下空間，也凸顯自主性與專業能力之間的張力。

## 2. 社區營造基地的中介功能

基地作為社區與官僚體系之間的橋樑，承擔政策語言翻譯、資源媒合與能力培力的角色。透過課程、諮詢與計畫輔導，協助社區克服行政與專業限制。然而，基地在「輔導」與「代勞」之間常陷入矛盾：一方面，代勞確保社區能獲得資源；另一方面，卻可能削弱社區自主性，造成依賴，並形成在地知識能否被政策採納的權力門檻。

## 3. 官僚制度與社區營造的張力

政府部門透過補助與績效評鑑來規範社區發展，但其標準化語言常與居民的生活語言脫節。對居民而言，健康課程或文化活動即是凝聚力量，但對政府而言，必須轉化為符合政策評估的指標。這種制度化要求使社區知識邊緣化，甚至形成「被規訓的自主性」。

## 4. 居民參與與文化脈絡

居民參與受年齡、職業與社會網絡影響，呈現差異化。青年因工作限制難以長期投入，退休志工與耆老則成為主力。參與動機多與地方情感與互助意識相關，而非單純政策導向。這使社區行動具有特色，但也往往漸進、局部且非線性。

## 5. 資源限制與策略性合作

有限的補助與捐助使社區必須在設計與執行中尋求合作。社區仰賴基地專業以取得資源，基地需在政策與地方需求間折衝，而政府則維持控制。三者互動使社區營造同時具有自發性與制度依附性，成為權力、知識與資源博弈的場域。

## 6.基地的角色反思

在田野中，基地展現了資源媒合、計畫輔導與培力教育等功能，但也面臨三大挑戰：自主性與依賴性：過度介入易使社區成為「代辦型」，過少協助又讓社區因無法操作而退出；資源分配不均：熟悉遊戲規則的社區常年獲補助，而弱勢社區被邊緣化，形成「會者恆會，不會者恆不會」的結構性落差；培力邊界模糊：基地應該「提供工具」還是「直接代勞」？過度代勞會弱化學習，但完全放手又使行動停滯。基地不只是行政輔助者，更牽涉權力、資源與知識生產。它一方面縮短了政策與地方的距離，另一方面卻可能強化既有不平等，使社區實踐趨向「模板化」與「同質化」。因此，基地應定位為「橋樑與陪跑者」，在尊重自主性的前提下提供必要支持。若政策能簡化流程並改善資源分配，社區才有更公平的基礎參與，基地也能真正回歸「輔助」角色，而非「取代」角色。

## 二、地方創生的角色：建構、解構與再建構

### 1.地方創生的概念與意義

地方創生作為當代地方發展策略的重要概念，其核心在於透過產業創新、文化活化與社會網絡的重建，使老化或資源匱乏的地方能夠重新獲得生機與活力。與社區營造相比，地方創生更強調經濟可持續性與產業創生，並將地方文化、居民網絡與經濟活動結合，形成新的地方價值。地方創生不僅關心文化傳承、社群凝聚，也著眼於如何讓地方經濟活動能夠自給自足，甚至帶動區域整體的經濟發展。

然而，地方創生的實務操作並非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它是一種複雜的建構、解構與再建構過程。地方創生的「建構」意味著重新組織地方資源、文化資本與居民網絡，建立新的社會與經濟關係；「解構」則指新生代創業者、外來青年或專業團隊，對傳統產業模式、社會規範與地方治理結構提出質疑，打破既有框架；「再建構」則是在這種批判與調整之後，建立新的運作規則，使地方文化、產業與社群在現實經濟環境下得以生存並持續發展。

## 2.地方建構：文化、網絡與產業起步

在台灣多數地方社區，尤其是資源有限的鄉村與小鎮，社區並未擁有雄厚的財力或完整產業鏈。地方的核心資源多是文化、歷史脈絡與居民網絡。以高雄旗山區的香蕉產業為例，地方創生首先是對「地方」的建構：這裡的香蕉園、在地蕉農、村史與地方小旅行，形成文化與社群網絡的核心。社區居民透過長期的農業實務累積豐富的地方知識，對作物、季節、氣候與農耕技術有深刻理解，而這種知識與地方創生活動密切相關，是產業創生的基礎。

在地方創生的實踐中，「地方」與「創生」需要被分開理解：地方代表文化、社群連結與生活脈絡；創生則指產業的新起、經濟的永續與價值的變現。以旗山台青蕉為例，青年創業者，自己身為在地蕉農，同時整合農產品加工與創意行銷，將地方資源轉化為可消費的商品與文化體驗。例如，一斤成本不到十元的香蕉，經過品牌包裝、故事行銷及加工後，台青蕉的產品能夠以三十元甚至更高的價格銷售，並吸引外地消費者。這種價值提升的背後，是對地方文化的理解、創意轉化與產業鏈再造，也是地方創生「建構」的一部分。

地方創生的建構過程，並非單純模仿商業課本上的行銷邏輯，而是結合在地扎根與永續理念。消費者的選擇不只是對產品本身的需求，更是對地方故事、文化脈

絡與社群價值的認同。地方創生透過這種文化與經濟的整合，使產業創生不再只是賺錢，而是對地方有形與無形資源的再配置。

### 3.地方解構：新生代與自創遊戲規則

地方創生中的「解構」階段，主要由新生代創業者或外來青年主導。他們對傳統產業模式提出質疑，將原有社會結構與經濟規律，創造新的運作邏輯。以旗山台青蕉為例，新生代青年進入香蕉園，不僅學習傳統農耕技術，還重新思考產品價值、行銷策略與市場定位。他們自創遊戲規則：利用社群媒體推廣、整合文化活動與農業體驗，打造既有經濟效益又符合地方文化的產品。

解構的過程中，地方創生必須面對市場需求、成本控制、氣候風險與競爭壓力。香蕉作物受颱風影響極大，一旦損失，農戶承擔直接風險，地方創生團隊則必須設計應對機制，例如多元化產品、加工延長價值鏈，或透過品牌行銷提升附加價值。這種應對策略不是傳統社區營造所能提供的，它將創意、商業邏輯與地方文化緊密結合，形成新的地方運作模式。

新生代創業者的解構還體現在社會角色的重新定位。他們不只是農民或地方居民，更是創業者、文化推廣者與市場運營者。這種多重身份，使地方創生既面對社區期待（文化保存與社群凝聚），也面對市場壓力（產業盈利與品牌維護）。在這個過程中，創生者必須學會在不同利益、文化價值與經濟效益之間取得平衡。

### 4.地方再建構：產業、經濟與永續

地方創生的最終目標是「再建構」：在建構與解構之後，建立一個可持續運作的地方經濟與社群生態。以台青蕉為例，再建構的具體表現包括，產業鏈整合與創新：從香蕉種植、採收、加工、包裝、銷售到體驗活動，形成完整產業鏈，並在過程中引入創意產品，如香蕉乾、香蕉蛋糕、香蕉花茶，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在地文化再現與品牌化：將地方歷史、農業故事與社區特色融入品牌行銷，形成「文化+經濟」模式，使消費者不僅購買商品，更購買地方故事與體驗。社會網絡與人才培育：透過田野實習、工作假期與志工活動，將青年與地方居民連結，形成可持續的社群網絡，也培育下一代地方創生者，確保地方文化與產業持續傳承。永續經營與風險管理：面對氣候、政策與市場變化，建立靈活的經營模式，如室內加工、產品多樣化、跨區域銷售，保障地方創生活動的長期穩定。這種再建構不只是經濟運作，更涉及社會影響力與治理模式。例如，地方創生團隊在市場運作中，需與當地農戶協商採收、加工與銷售計畫；在社區文化上，需尊重地方歷史與居民習慣，避免文化壟斷或過度商業化。再建構的核心，是建立一種可持續的「地方生態系」，使產業、文化與社群相互支撐。

#### 5.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的交集與差異

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有共同的價值基礎：希望地方活絡、文化得以保存、居民能參與。兩者在出發點與操作模式上存在差異：經濟導向：地方創生以產業盈利為核心，社區營造則不以經濟回報為主要目標，更多強調社會服務、居民關懷與社會資本累積；參與對象：地方創生多由新生代青年或外來創業者主導，社區營造則以在地居民、耆老與志工為主，強調地方情感與歷史脈絡；成功定義：地方創生的成功通常以經濟成果、產業持續性與市場認同衡量；社區營造的成功則以居民參與度、社群凝聚力與文化維護為標準；運作模式：地方創生需要兼顧市場、資金與政策補助，強調企劃、計畫與品牌化操作；社區營造則更偏重生活實務、志工協作與社會服務。

以高雄旗山台青蕉為例，青年創業者在地方創生過程中，既參與採收、加工，也負責市場行銷與品牌管理。他們的操作不只是解決個人或企業問題，更在於建立地方產業生態、活化社群網絡，形成一種「文化+經濟」的再建構模式。這種模

式不同於傳統商業行銷，因為它以地方文化與居民網絡為基礎，而不是單純追求市場份額或消費需求。

## 6.政策、基地與地方創生的互動

地方創生的推動離不開政府政策與社區營造基地的支持。政府提供資金、補助與政策框架，社區基地則擔任培力、諮詢與資源媒合角色。然而，這種支持有其邊界與張力：政策影響行為：補助與績效評鑑影響地方創生者的策略選擇，例如如何設計計畫、如何呈現成果。熟悉政策規則的人往往能更有效獲取資源，形成競爭優勢；基地角色的限度：基地應提供技術協助、計畫輔導與資源媒合，但過度介入可能削弱社區或創業者的自主性。實務上，基地需要在輔導與代勞之間取得平衡。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的轉換：在部分案例中，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並非完全分開，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社區營造提供文化、社群與生活基礎，地方創生則將其轉化為經濟價值與產業模式，形成完整的地方活化生態。

## 7.案例分析：旗山台青蕉

在旗山台青蕉的田野觀察中，地方創生者的日常操作呈現高度複雜性與動態性。採收香蕉、剝香蕉花、包套保護果實、加工香蕉乾、製作香蕉蛋糕，直至在市集或展覽活動中銷售，每一步都需考慮品質、效率、品牌形象與消費者體驗。青年創業者同時兼具農民、創業者、文化推廣者與市場運營者角色，將地方文化與經濟活動結合。田野觀察中發現地方創生中的社會互動：在田間與當地農民、志工及創業者共同工作，體驗季節、天氣、作物生長過程與農事操作；同時，地方創生團隊需管理現場、與農戶協商、與消費者互動，甚至面對競爭對手的行為。這種全方位的操作，使地方創生成為一個建構、解構與再建構的複雜社會實踐。

旗山台青蕉的案例亦顯示，地方創生的成功不僅是賺錢，而是形成一種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生態。青年創業者透過品牌化、故事行銷與產品多樣化，使地方文化、

社群網絡與產業創生緊密結合。這種模式不同於純商業行銷，因為它基於地方脈絡與社群認同，而非單純需求創造。

#### 8.小結：地方創生的本質與挑戰

地方創生的本質在於提供「地方生存的方法」：使人口老化或外流的地方能夠持續活絡，使年輕人能夠回鄉創業並維持生計。它與社區營造的理念相似，都希望地方得以活化、文化得以保存，但地方創生更強調經濟自主、產業永續與市場運作。地方創生是一個動態的建構、解構與再建構過程：建構：整合地方文化、居民網絡與歷史脈絡，形成創生基礎；解構：由新生代創業者重新審視傳統產業與社會結構，創造新的遊戲規則；再建構：建立可持續的產業、生態與文化網絡，將地方價值轉化為經濟效益與社會影響力。實務中，地方創生需兼顧政策、基地輔導、居民參與與市場需求，其成功定義不僅是經濟效益，也包括文化保存、社群凝聚與永續運作。政策與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使地方創生者需要具備多重能力：農業知識、創業經營能力、行銷與品牌操作能力，以及社會互動與網絡協調能力。最終，地方創生的核心在於創造雙贏：讓地方居民、青年創業者與消費者都能從中獲益，使老去的地方能夠再生，而不只是外來資本或政策的單向介入。它是一種嵌入在地方、文化與經濟之間的社會實踐，是對社區營造的補充與延伸，也是新生代對地方未來的想像與實踐。

### 三、田野經驗：社區發展協會基地與旗山香蕉案例

在探討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實務運作時，田野經驗提供第一手的觀察與反思。透過實地參與旗山地區的社區發展協會基地運作，以及台青蕉的地方創生實務，我們可以深入理解地方活化的操作模式、文化經濟整合，以及政策與社群互動的多層面挑戰。

#### 1.社區營造的田野經驗

在實際的田野觀察中，社區營造的日常樣貌與地方創生迥然不同。社區營造的核心，不是經濟產出或市場競爭，而是居民之間的互動與社群生活的改善。以社區發展協會基地為例，它所承載的功能，往往與「生活」最直接相關：老人共餐、日間照護、社區清潔、環境改造、文化活動、居民教育等。這些行動雖然看似瑣碎，卻構成社區穩定運作的基礎。

在觀察過程中，最顯著的印象是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助性」。例如，某些社區會安排志工團隊進行長者送餐，不僅僅是提供食物，更是透過聊天與陪伴，減少獨居老人的孤立感。另一類行動則聚焦於文化傳承，例如社區組織主辦的手工藝課程，不僅讓居民學習技能，也延續地方傳統文化，並在節慶時透過展示和展售，讓更多人看見地方特色。這些活動的重點並不在於「盈利」，而是「凝聚社區的認同感」。

社區發展協會基地在其中扮演「輔導者」與「協助者」的角色。許多社區在行政操作上並不熟悉，例如計畫書撰寫、活動核銷、經費報告等，對地方志工來說往往是一大負擔。基地人員會安排課程，教導社區如何完成這些行政任務，並在需要時提供一對一協助。這樣的輔導，讓社區能更順利取得補助與資源，進而維持營運。但在過程中也出現一種張力：基地若「幫得太多」，容易讓社區形成依賴，失去自主性；若「幫得太少」，又可能使社區因資源不足而停滯。這種「介入與放手的平衡」成為社區營造輔導中一項關鍵課題。

此外，社區營造所面對的「成果」定義，也與地方創生大不相同。對於社區居民而言，一場成功的共餐活動、一場熱鬧的晚會、一段傳統技藝的延續，就是社區營造的價值展現。這種成果雖然無法直接轉換為金錢或產業效益，但卻維繫社區日常生活的品質，並使居民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換言之，社區營造是一種以「社會力」為核心的實踐，它的成敗不在於營收，而在於居民是否因參與而感受到生活更有價值。

## 2. 旗山香蕉的地方創生經驗

相較之下，旗山的「台青蕉」案例，則展現地方創生的另一種實踐邏輯。旗山向來以香蕉聞名，但隨著農業結構變遷與市場價格波動，蕉農面臨產銷困境。青年創業者進入旗山，嘗試透過「文化與產業的再建構」來翻轉困境。他們不僅僅販售香蕉，而是將香蕉與在地故事、農業體驗、加工產品與文化行銷結合，創造出一套新的產業模式。

田野經驗，地方創生在操作上極具挑戰性。參與香蕉園的工作，意味著青年創業者與實習生必須與蕉農並肩合作，經歷從採收、剝花、搬運、加工到包裝的一整套流程。香蕉是一種一次性收成的作物，採收後便須立即處理，加工成香蕉乾、香蕉蛋糕等產品，以延長價值鏈。這些產品在市場上售價遠高於傳統香蕉（如一斤三十元對比產地價格不足十元），原因在於其附加的「地方文化故事」與「消費體驗」。

然而，這樣的運作並不單純。青年創業者需要同時應對颱風、暴雨等自然風險，還要面對市場競爭與成本控制的壓力。此外，與在地居民的關係亦可能充滿張力。一方面，他們需要農戶的支持與合作；另一方面，他們的經營方式也可能挑戰既有的地方規則，甚至引發「誰有資格代表地方」的疑問。在展攤經驗中，也觀察到其他商家模仿其產品與行銷方式，這既顯示模式的成功，也反映競爭環境的嚴苛。

旗山香蕉的案例凸顯「建構—解構—再建構」的地方創生過程。首先是「建構」：青年創業者將旗山香蕉與地方故事包裝成文化產品，創造市場認同；其次是「解構」：他們挑戰傳統農業僅靠生產的模式，改以品牌行銷與文化體驗取代單純的價格競爭；最後是「再建構」：透過加工品與文化活動，將地方香蕉重新定位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讓旗山重新獲得經濟與社會雙重價值。

以地方文化為基礎，透過創新產業與行銷策略實現價值變現。與純商業行銷不同，地方創生關注文化保存與社群參與，例如透過展覽、地方小旅行與在地故事收集，讓消費者理解並認同地方特色，而非僅基於價格或需求做選擇。這種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展現地方創生的再建構能力。

### 3.兩者的差異與交集

將社區營造與旗山的地方創生並置比較，可以看見兩者之間的差異與互補性。社區營造偏重於「文化保存」與「社群凝聚」，其價值在於維護居民生活品質與地方認同；地方創生則強調「產業發展」與「經濟永續」，透過市場運作為地方創造生存的新可能。但兩者並非截然對立：旗山的青年創業者之所以能成功，部分仰賴於社區既有的文化基礎與居民網絡；而社區的活動若能與產業創新結合，也更有機會獲得外部資源支持與長期發展。

因此，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關係，不是「取代」或「競爭」，而是「交集」與「互補」。一者提供文化與社群的根基，一者延伸至產業與市場的運作。田野經驗說明，唯有兩者能夠在尊重自主性的前提下相互協作，地方發展才可能真正走向永續。

在當代地方發展中，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兩者都以地方活化為核心目標，但其理念出發點、操作模式、衡量標準與實務策略各有差異。社區營造偏重於文化保存、社群凝聚與生活品質改善，而地方創生則在此基礎上延伸產業創新、經濟永續與市場化運作。在實際參與兩者運作方式，可以更清楚理解其差異、交集以及互補性，並提供實務操作的理論框架。

#### 四、社區與地方創生的差異與交集

##### 1. 目標與出發點及操作模式的差異

社區營造的核心目標在於維護地方生活脈絡與促進社群互動。這種模式的出發點通常源自居民需求，例如地方老年人的日常照護、社區節慶的舉辦、傳統工藝的復興或環境改善。這些行動不以盈利為核心，而是以社群價值、居民幸福感與文化延續作為衡量標準。社區營造所關心的是「生活品質」與「社群凝聚」，強調地方自主性與居民參與，通過日常實踐累積社會資本，使社區能夠在自我運作中保持活力。在操作模式上，社區營造多由在地居民主導，偏向志工協作、生活實務與社會服務。例如，社區發展協會可能經營老人日間照護、地方工藝工作坊、社區環境改善或節慶活動。這種操作模式以自發性為主，財務來源通常依賴地方政府補助、承辦人自掏腰包，被要求不能有經濟行為。操作過程中，居民參與與社群互動是成功的關鍵，透過累積信任、共識與合作經驗，社區能夠保持自主運作，並增強凝聚力。

相比之下，地方創生的出發點更偏向經濟與產業發展，其核心邏輯可以用「地方與創生分離思考」來理解。地方本身代表文化、居民網絡、村史、生活脈絡等在地資源；創生則指產業新起、經濟永續與價值變現。在這個框架下，地方創生的目標不僅是保存文化，還包含創造市場價值與提升地方經濟自給能力。以高雄旗山台青蕉為例，青年創業者將地方香蕉園、在地蕉農與文化故事整合，發展成香蕉產品、加工品以及文化體驗活動，並以市場機制維持產業持續運作。這種模式的核心是盈利，但同時兼顧地方文化傳承與社群網絡維護，形成「文化+經濟」的雙軌運作模式。這也意味著地方創生在策略上，需要將文化、產業與市場整合，使地方資源能夠在經濟運作中持續活化。在操作模式上，地方創生則更加複雜，融合市場、品牌、產業與社群互動。旗山台青蕉的案例中，青年創業者除農業種植、採收、加工與產品包裝外，還需負責銷售、文化體驗活動與品牌行銷，並面

對氣候變化、成本控制與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這種模式的運作是多層次且動態化的：農業生產提供基礎產品，品牌與行銷提升價值感知，文化故事與在地體驗加深消費者連結，同時社群網絡支撐生產與經營的可持續性。地方創生的操作強調「建構—解構—再建構」：首先建構在地資源與文化基礎，再解構傳統產業運作模式，以新生代創業者的視角自創遊戲規則，最後再建構可持續的產業與社群生態。

## 2. 成功標準與評估指標

社區營造的成功標準主要依賴社群凝聚、居民參與度、文化保存以及生活品質提升。例如，地方老人參與活動的人數增加、傳統節慶復興、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提升，都是衡量社區營造成效的重要指標。這種成功指標以社群價值為核心，注重內部運作與居民福祉，而非外部經濟收益。

地方創生的成功標準則更傾向綜合考量經濟、產業與社群影響力。經濟成果如產品銷售量、收益、產業持續性是基本指標；社會影響力則包括青年回鄉創業、地方文化活化、居民收入提升以及社群互動增強等。旗山台青蕉的實例顯示，地方創生的成功並非單純的盈利，而是在文化、產業、社群與經濟層面同時取得平衡，使地方能夠永續運作並持續吸引外部資源與參與者。

## 3. 交集與互補性

儘管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在目標、操作模式及成功標準上存在差異，兩者在理念上卻高度交集：都希望地方活絡、文化傳承、居民能參與。社區營造提供文化與社群基礎，使地方創生得以在經濟運作中依附於穩固的社群網絡與文化資源，避免產業操作脫離地方脈絡而成為外來經濟輸入。地方創生則將社區資源轉化為產業運作與市場價值，提供經濟收益、吸引外部參與，並透過故事與體驗深化地方認同。

旗山的實務案例充分展示這種互補性：社區發展協會提供基礎資源、社群網絡與文化支持，青年創業者則將這些資源延伸至產業運作與文化行銷，使地方創生落地並實現永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青年創業者與社區居民互動，形成雙向學習與合作，既保障文化傳承，也創造經濟價值。這種模式體現地方活化的完整生態：社群為基礎，產業為延伸，市場為保障，文化為核心。

此外，交集還表現在政策與資源運用上。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皆可透過政策補助、培力課程與社區基地支援獲得外部資源，但兩者的資源使用策略不同。社區營造偏向文化活動與生活改善，資源使用較分散且小規模；地方創生則需整合資源以支持產業運作、品牌行銷與文化包裝，資源運用更具策略性與規模性。這種差異在操作中常需協同調整，確保社群文化與產業經濟的平衡，避免經濟運作過度壓縮社區自主性或文化價值。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雖然在目標定位、操作模式及成功指標上呈現差異，卻在理念上相互呼應並形成互補。然而，兩者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仍不可忽視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不論是社區營造或地方創生，其持續性與規模往往依賴政府補助與政策框架的支持。換言之，若抽離外部補助與官方所建構的成功範本，社區營造是否可能淪為少數熱心人士以志願服務或公益精神所維繫的「善意行動」？而地方創生在缺乏資源支持下，是否僅止於產品加上文化包裝的行銷，難以真正維持產業生態與地方再生的目標？

這樣的反思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當地方方案的價值究竟由誰來界定與維繫？是政府透過補助與評比所設定的標準，還是社區與在地行動者自身能夠持續生成的生活需求與文化脈絡？此一張力揭示了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之間未竟的課題——如何在政策支持、經濟可行性與社群自主性之間取得平衡，避免兩者分別陷入「政策依賴」與「市場化過度」的雙重困境。未來的研究與實務實驗，或許更需要探

問：在沒有外部補助的情況下，地方行動是否仍能建立一套自主運作的機制，並同時兼顧文化價值、社群網絡與經濟永續？

## 五、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互補性

在近二十年的台灣地方發展進程中，「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成為兩股並行的政策與實務潮流。兩者雖然起源不同，卻在理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都希望改善地方生活條件，讓社區能在全球化與人口外流的壓力下，持續展現生命力。然而在操作面上，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各有其重點與限制，前者重視文化、社群與居民參與，後者則強調產業、經濟與市場機制。這樣的差異並不是互斥的，而是形成互補，使地方發展能夠在文化與經濟兩端取得平衡。

### 1.文化與社群基礎：社區營造奠定地方創生的土壤

社區營造自 1990 年代以來，主要目標是文化保存、生活改善與社群凝聚。無論是舉辦廟會節慶、復興傳統工藝，還是營造老人活動空間與社區小旅行，這些行動都在累積「文化資本」與「社群網絡」。這些基礎雖然短期內不一定帶來經濟收益，卻讓社區逐漸建立起共同記憶與合作關係。

這種文化與社群基礎，正是地方創生得以落地的前提。若沒有社區營造長期的努力，地方創生往往淪為表面行銷，缺乏文化內涵。例如旗山的青年創業者能夠將香蕉故事轉化為品牌價值，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因為社區早已有文化活動、文史整理與居民參與的累積。換言之，社區營造像是為土地翻耕，讓地方創生能在肥沃的土壤中發芽。

### 2.經濟與產業延伸：地方創生轉化社區成果

社區營造雖能保存文化，但若僅停留在活動與聚會，很容易因缺乏資金而難以為繼。地方創生正好提供解方：透過產業模式與市場機制，把文化與資源轉化為經濟價值。

以旗山為例，香蕉文化原本多存在於居民的口述記憶與生活經驗中，社區可能透過展覽或活動維持其能見度。但當青年創業者以「台青蕉」的品牌將其轉化為商品、體驗與旅遊路線時，香蕉不再只是歷史回憶，而成為持續生產收益的產業。這樣的延伸讓文化保存與經濟運作形成良性循環：文化提升商品價值，商品銷售反過來支持文化再生。

因此，地方創生的角色不僅是創造收益，更是賦予社區營造成果新的生命。透過市場機制，地方創生使社區營造的努力得以持續，避免陷入「活動辦完即結束」的困境。

### 3.人才與培力互動：社區與產業的雙向養成

在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實務中，人才培育是關鍵議題。社區營造需要能夠組織居民、推動活動的在地領導者；地方創生則需要懂產業、懂市場的青年創業者與專業人才。兩者在需求上不同，但卻能互補。

社區營造透過社區大學、居民工作坊等形式，培養居民的組織與參與能力，建立合作文化；而地方創生則透過基地或創業平台，培育青年在品牌行銷、產業經營上的能力。當這兩種人才培力互相交流時，就能形成完整的鏈結：居民提供文化與社群基礎，青年提供專業與創新，兩者合作，共同打造地方的新面貌。

旗山的案例再次說明這點。青年創業者在基地的協助下，不僅學習農產加工與品牌經營，更在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中獲得文化故事與地方認同。這種雙向養成，使地方創生不只是單純的「產業發展」，而是社區與產業的共生。

#### 4.政策與資源整合：合作提升效率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在實務上，都高度依賴政策與資源支持。政府提供的補助、計畫與平台，往往是行動能否持續的關鍵。然而，若兩者分開運作，可能出現資源重疊與效率低落的問題。

例如，社區可能申請文化保存計畫，青年團隊則申請產業創新計畫，兩者若缺乏對話，容易造成重複投資，甚至彼此競爭。但若能透過基地或地方平台整合，則能讓資源更有效率地使用：社區提供文化與居民動能，青年團隊進行產業轉化，政府則透過補助與政策把兩者連結起來。這樣的整合不僅避免浪費，也能提升地方發展的整體效益。

#### 5.旗山案例的啟示：互補的實踐

旗山台青蕉的案例，具體展現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互補性。青年創業者在基地的輔導下，與蕉農合作，將農業生產與文化記憶轉化為品牌產品與消費體驗。這個過程中，社區提供文化故事與人脈支持，基地提供計畫輔導與政策連結，青年團隊則進行產品設計與市場經營。

最終成果不只是香蕉的銷售，而是地方文化的活化、居民的參與感提升與產業的持續性。這樣的多重目標，正是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互補性的最佳體現。它告訴我們：地方創生並不是社區營造的替代，而是其延伸與升級；而社區營造若缺乏地方創生的接棒，則容易止步於「活動型」或「補助型」發展。

#### 6.互補性的社會學意涵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互補，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交織。社區營造累積的是信任、情感與文化象徵，屬於社會資本；

地方創生則將這些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使其能在市場中被認可與流通。兩者的結合，意味著地方發展不再只是單一維度，而是多重資本的轉換與平衡。

此外，這種互補性也挑戰傳統的政策邏輯。過去的政策常將「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分開思考，但地方實務顯示，兩者其實緊密相連。唯有文化的支撐，經濟才有在地特色；唯有經濟的支撐，文化才有持續再生的可能。這樣的觀點，為未來的地方政策提供重要啟示。

## 參、結論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在當代地方發展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策略工具，兩者在理念上雖有高度共通性，但在操作邏輯、目標設定與衡量標準上卻存在明顯差異。社區營造著重於文化保存、居民生活改善以及社群凝聚，其核心精神在於維護地方生活脈絡、促進居民互動、強化社群認同，並透過日常生活的改善與文化活動的維護，讓地方社區在日常運作中保持活力。地方創生則結合產業創新、經濟永續與市場運作，其目標不僅是保存文化，更在於透過「建構—解構—再建構」模式，將地方資源、文化故事與社群網絡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生態，創造新的產業價值與地方認同。

從田野經驗觀察，地方創生的運作必須依賴多方協同：青年創業者帶來創意與活力，在地農戶提供土地、技術與產業基礎，社區營造基地作為資源與政策的媒合者，提供計畫指導、補助申請協助以及培力教育，而政府政策與資源則提供外部支持與制度保障。這種多層次協作，讓地方創生不僅停留在個人或單一產業操作，而是形成一個涵蓋經濟、文化、社群與政策互動的完整生態。旗山台青蕉案例正是典型範例：青年創業者結合當地蕉農，進行香蕉採收、加工與文化故事包裝，將地方產業與市場運作相互整合，既保障農戶收益，也活化在地文化與社群互動。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差異在於核心價值與運作邏輯。社區營造重視社群自主性與文化保存，不以盈利為首要目標，其運作方式偏向自發、志願協作以及地方生活日常維護。而地方創生則以產業創新與市場化為核心，追求經濟永續，將地方文化與社群資源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價值，並結合品牌、行銷與消費者互動，讓地方資源在市場中產生新的價值。這也意味著地方創生必須面對更多變數，例如市場需求、氣候風險、成本控制、政策補助與地方居民互動等，操作過程更複雜，對青年創業者的能力要求更高。

然而，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在理念與功能上具有高度互補性。社區營造提供文化保存與社群基礎，使地方創生在經濟操作中能依附於穩固的社群網絡與文化資源，避免地方產業脫離在地實際需求而成為外來經濟操作的單向輸入。地方創生則將社區資源轉化為產業運作與市場價值，提供經濟收入、吸引外部參與者，並透過文化故事包裝與在地體驗，讓消費者理解並認同地方特色，進而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旗山台青蕉的實務操作即是此互補性的最佳實例：青年創業者，同時自己本身也是農民、文化故事收集與市場行銷，將香蕉產業轉化為既具文化價值又能產生經濟效益的地方創生模式。

社區營造基地在這一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其功能既是資源媒合者，也是培力者。基地需在提供協助與保持社區自主性之間取得平衡，例如在協助計畫書撰寫、政策申請、活動規劃時，既要提供專業指導與操作方法，又不能完全取代社區或青年創業者的決策，否則可能削弱地方自主性或形成依賴性。田野觀察中，部分社區對計畫書撰寫完全陌生，需要基地一步步指導，這凸顯基地角色在培力與自主性之間的微妙定位：既要給予足夠支持，使地方創生得以落地，亦要讓社區與青年創業者保持主導地位，形成真正可持續的地方自我運作能力。

在政策與補助體系中，成功模板往往由既得資源者與熟悉申請流程者所定義。這種制度安排雖有其效率，但可能造成地方資源配置不均，對未熟悉政策或缺乏經

驗的社區與青年創業者形成挑戰。地方創生的核心價值在於文化、產業與社群整合，並非單純以獲取補助或經濟收入為標準。成功應被理解為地方文化能持續傳承、社群網絡能有效運作、青年創業者能獲得自主生計，以及在地產業能持續發展，這些要素共同構成地方再生力的評估標準，而不僅是財務收益或政策認可。

此外，地方創生也反映「建構—解構—再建構」的動態過程：建構是對地方資源與文化的認識與整理，解構是新生代面對資本主義、政策規則與市場挑戰所進行的重新組織，再建構則是將這些元素整合為新的產業模式與社群互動方式。旗山台青蕉青年創業者的實務操作展示這一過程：他們在原有香蕉產業與地方文化基礎上進行創新，加入市場策略與產品包裝，並將在地故事融入行銷與體驗活動中，使地方資源獲得新的生命。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結合，不僅讓老去的社區得以活化，也提供青年回鄉創業、居民維持生計的實際可能性。它們共同形成地方的再生力，使文化、社群、產業與經濟在地方層面達到可持續的循環。更重要的是，這種結合使地方不僅是消費與生產的場域，更是文化傳承、社群互動與社會實踐的空間。政策與補助應以此為導向，支持每個地方在尊重在地自主性與文化脈絡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社群與文化的共生發展。

總結而言，社區營造提供地方文化、社群連結與生活維護的基礎，而地方創生則將其延伸至產業、經濟與市場化運作。兩者相輔相成，形成從文化保存到經濟永續的完整發展生態。地方創生的核心不只是經濟收益，而是透過青年創業、社群互動與文化活化，使地方得以持續運作、永續發展與創新轉型。這種理念的實踐，彰顯當代地方發展的新可能，也為政策制定者、社區經營者與青年創業者提供可行的行動框架與實踐經驗，展現地方永續發展的多重價值與潛力。

中文參考文獻

木下齊(2017)。《地方創生：小型城鎮、商店街、返鄉青年的創業 10 鐵則》，張佩瑩譯。新北：遠足。

行政院國發會(2018)。〈「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 次會議紀錄〉。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示範計畫，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李晏佐(2023)。在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之間：實踐的反思。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61(3)，11-62。

李永展(2002)，全球化與社區產業經營：以南投水里上安社區為例，「建築與規劃學報」，第 3 卷，第 1 期，第 1-14 頁。

周志龍(2002)，「全球化、知識與區域」，台北：詹氏書局。

林育靚、吳連賞(2018)。地方創生初探－從傳統產業找生機。東方學報，(39)，125-135。

高啟霽：【投書】什麼是「地方創生」？這項解藥，能讓寶島不淪為又窮又老的鬼島(上網日期 2018.01.25)取自 <http://bit.ly/2M3qtx>。

張漢寧，「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金門串街路 老街再生，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二十二期，第 104-110 頁，2018。

陳美伶，「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台灣地方創生的起步，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二十二期，第 2-7 頁，2018。

陳其南(1995)，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發展，「台灣手工藝」，第 55 期，第 4-9 頁。

陳錦煌、郭程元(2004)，社造十年的省思，迎向下一個十年：社區發展、社區營造與社區 總體營造，「2004 好鄰居研討會：邁向下一個社造十年論文集」，台北，第 9-30 頁。

曾梓峰(2003)，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與永續社會發展，「文建會網路學院 case 智庫：社會總 體營造」，第 33-38 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生命共同體』之論述分析」，國 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佳璋，「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乘載東港過去與未來的美麗密碼：東港 DNA，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二十二期，第 94-103 頁，2018。

劉立偉（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劃，35(4)，313-338。

劉新圓(2005)，日本社區總體營造的發軔與運作。「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 究報告，教文(研)094-009 號」(2008 年 10 月 30 日)。

劉立偉（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劃，35(4)，313-338。

蔡弘睿（2016）。探究社區根本的價值與能量—從英國的社區培力與發展經驗探討臺灣的社區培力機制。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6(2)，27-53。

賴美蓉(2005)，社區規劃師之角色探討，「造園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第 1-16 頁。

夏鑄九(2007)，做為社會動力的社區與城市：全球化下對社區營造的一點理論上的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5 期，第 227-247 頁。

增田寬也（2019）。《地方消滅：地方創生的理論起源》。臺北：天下文化。

#### 英文參考文獻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Girswold, W.,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P. 15, 1994.

Pestoff, V. (1998). Beyond the Market and State: Social Enterprises and Civil Democracy in a Welfare Societ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